

一次深刻的手術經歷

神經外科專科醫生 李世偉



手術中途有時會出現一些突發情況，猶記得多年前一次深刻的手術情景，到現在想起依然歷歷在目。

一名五十多歲的女士因劇烈頭痛而入院，經電腦掃描檢查發現她腦內蛛網膜下腔流血，再進一步作血管造影圖檢查之後，確認是腦動脈血管瘤破裂所造成，便立刻為她安排緊急開腦手術。早前在本欄中亦有提過，腦動脈血管瘤第一次破裂後要立刻做手術，因為除了處理壓着神經的血塊外，血管瘤於短時間內再次破裂的機率亦大幅提高。更甚的是，二次破裂對腦部造成的破壞極為嚴重。病人會有很大的生命危險，假使可以保住性命，病人很大機會都會嚴重傷殘或變成植物人。

手術台上，我們打開頭皮、頭骨、腦硬膜，在顯微鏡的輔助下，將腦組織小心地撥開，慢慢進入血管瘤位置。病人的血管瘤長在剛進入腦部的一條大動脈之上，其時我和團隊成員正在準備安全措施，一旦血管瘤突然破裂，可以立時夾住相應的血管止血。事實上，血管

瘤在手術中途破裂並不常見，但要以防萬一。果然，血管瘤突然破裂，病人的血壓亦正急速下降。而我當時清楚知道，如果我不能在兩分鐘內成功止血，病人就會喪命。

病人當時極之危險，血流得很快，顯微鏡下的腦組織亦變得模糊。本來已經嚴肅的手術室內，氣氛進一步跌至冰點。當時我對自己說，作為主刀醫生的自己絕對要保持鎮定。如果我慌張，整個團隊亦會慌張起來。我馬上吩咐護士開大吸管，將血液吸清；叫麻醉科醫生密切監察病人血壓；自己再集中精神將腦組織分清解清楚，用手術夾將動脈瘤夾下，最後成功止血。

記得確定腦動脈瘤已被成功夾下的一刻，我高聲歡呼一下之後，就出現因巨大壓力所致的劇烈肚痛。完成手術後，同事們說我當時十分鎮定，毫不驚慌。我說當然不是，在目擊血管瘤破裂當下，其實是緊張得要命。病人送往手術室前神志清醒、尚有交談能力，如果我因慌張而未能能在短時間內成功止血，她的性命就會斷送在我手上了。跟病人經歷過生死一線間，最後看見她完全康復出院，那滿足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學問的最佳狀態

陳劍梅



朋友在一公開演講上分享以色列家庭傳統的教育原則，原來是個良方。我最高興的就是發現遠方有人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最近這種

以色列的幼兒教育法吸引了一位中國著名學者遠道去考察。這個良方就是從小鼓勵孩子「學問」，這個方法我早已在大學應用了。

中國家長指導子女常會重複地每天問同一句，就是說：「今天你在學校學了些什麼呢？」但以色列家長向子女了解學習的事情，卻並不會如此。他們會重複地每天問另一句，就是說：「你今天在校問了些什麼問題呢？」後者認為學到了些什麼不是最重要，獨立思考才是最重要。

關於年輕人發問，我又有所發現。之前香港舉行國際電影節，大會請來多位大師級導演主講大師班，吸引了很多香港本地及留

學生去觀摩和學習。每晚台上嘉賓對談之後，必定把對話開放給台下觀眾。莘莘學子便會列隊在會堂的兩旁等候，主持人給予機會了，便輪流發問。這幾天有不少問題是非常有深度的，但是也有其他問題比較奇特。筆者接着不披露日期，也不會公開人名與讀者分享一則。

有一晚，第一和第二個珍貴的發問權同被一位外地打扮濃艷的年輕女子奪得。她說：1)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in person? (我可以私下向您發問嗎？大師沒有回應。) 2) Why did you make this film in a village? (為何您要在村裏拍？)，然後她繼續充滿自信地用非常流利但文法不對的英語協助導演去理解這個這麼簡單的問題，過程甚長，佔了發問時間的七至八倍。導演很耐心地回答後她很高興，還繼續發言(並非發問)，並邀請導演下次來香港拍電影。

她的問題是否由衷，我們無從稽考。我



啟發孩子發問有助於獨立思考

資料圖片

坐在一旁，當時感覺發問的過程出現很多表演元素。其實充滿好奇心發問就是最佳的狀態，還要用赤子童心。

把家人當朋友，把朋友當家人

徐貽聰



人的一生中，接觸最多的應該是家人和朋友。「家裏人」，就是一個家庭裏的組成人員；除去家人以外的，都可以視為朋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兩者很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打仗親兄弟，「為朋友兩肋插刀」，則道出兩者的重要性。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同這兩方面人的接觸密度會有所不同，但都不可或缺。如何對待他們，才能始終親密和諧，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應該是每個人都要認真考慮和實踐的事情。

家人，當然是指祖父母、父母親、兄弟姐妹、配偶及子孫等親人，也就是一般講的「直系親屬」。家庭裏一定會有不同的輩分，還會有長幼。中國對長幼有很多傳統和規矩，一般也對之視為天經地義，習以為常。朋友，大家也都會明白是指同學、同事、事業和日常交往中接觸到的人員，就是我說的「家人以外」的所有人，屬於相知或者不是非常相知的熟人。「朋友」之間的親密度不同，相交中有還有近，但多會以禮相待，互相幫助。「家人」和「朋友」有內外之別。無需諱言，對待「家人」和對待「朋友」，必然有親疏和感情上的明顯差別。至於「莫逆之交」類的朋友，相互關係可能勝過家人，則另當別論。

我以為，如果能夠「把家裏人當成朋友、把朋友當成家人」，並在實踐中切實做到如此，應該可以使得這樣的相互關係保持親近、和諧。如果能夠將之形成習慣，持之以恆，就會有利個人，有利家庭，有利社會。

我想說的「把家人當朋友，把朋友當家人」，不是要「混淆」兩者之間的界限，而是指在日常相處中應該把自己置放在什麼位置上的基本考慮和行動標準，目的在於如何相知、相容、相悅，又能使得家庭、社會更加和諧、和諧、和平。

我很贊同「做人不要過分強調自己身份」的理解。每個人在家庭裏，在社會上，都會有自己的「身份」，輩分、職位是其明顯標誌。「不強調身份」，當然不是不要身份。承認身份，意識到自己的身份，還是必須要有的，這是起碼的規矩和法則。「不強調」，只是不要過分使用身份的「權威」、「地位」，而是應該平等地對待他人。我是「兒子」、「孫子」，但我不屈從；我是「父親」、「祖父」，但我不擺譜；我是「部下」、「下屬」，但我不卑不亢，我是「領導」，但我不居高臨下。或者說，懂得身份，不強調身份，處處以「尊重、平等、禮貌、道理」對待家人，對待朋友，當是幫助每個人成身、立身、影身的法寶。

可以直言不諱地說，我在這樣考慮，也在盡量這樣實踐，因為覺得它符合文明，不違背傳統。幾十年來，在家裏，我把父母、弟妹、配偶、兒孫都當作「朋友」，敬重他們，對每個人盡到自己不同「身份」的責任，但不對任何人使用「權威」，也不干預屬於他們每個人「自己的事務」，因而受到普遍的信任、尊重；在社會上，我把所有見到的人都當作「家人」，對他們以禮、以誠相待，予以理解，予以可能的幫助，也同樣得到各方明顯、突出的信任、尊重。其間，我給別人以好處，收到了更多的回應，讓我愉快，讓我成長。

經歷和經驗告訴我，「把家人當朋友，把朋友當家人」，不僅行得通，而且效果明顯，大有可為。我把它簡單歸納，告訴親朋好友，告訴世人，讓大家知道我的思考和實踐，或許還可以產生正面的些許家庭影響和社會效益。

我覺得，我的這個意識不應該是幻想，也不是「痴人說夢」。

順便告訴各位的是，此稿在發出前曾在我的大家庭內通過微信方式進行過討論，集思了廣益，思想連同文字都得到了全家近五十人的認可。

李苦禪：「趙錢孫李 李先念」

李輝



第一次我走進位於南沙溝的李苦禪先生家中。見到他，苦禪先生身體頗為健康。他當時告訴我，他今年八十五歲高齡，精神神真是好。畫畫，寫字，澆花，打太極……他好像一直沒有停息過。

李苦禪對恩師齊白石先生難以忘懷。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三日，李苦禪在香港《大公報》寫過一篇文章《憶恩師白石翁二三事》，開筆寫道：

十年浩劫時，早已長眠九泉的恩師白石先生也不得安寧，他的墓地一片狼藉，生前親手寫的墓碑已被砸得粉碎——

去年國家決定重修齊白石先生舊墓，中國美術家協會和齊家子弟請我這個八十五歲的老弟子為齊老重書墓碑。我非常高興，用了一個上午連寫了二十多條，選擇再三，命我兒子李燕仔細雙勾於另紙，送到美協。

今年清明，齊老師墓地修整一新，我與齊門弟子們一道去掃墓並參加新碑的揭幕儀式。是日風和日麗，漢白玉的墓碑愈顯得晶瑩聖潔。

李苦禪生於一八九九年，一九一九年他從山東來到古都北京，靠半工半讀或租拉「洋車」維持生計。得知有位湖南來到北京的齊白石先生，他冒昧前去拜訪，齊白石先生欣然同意李苦禪拜師。那一年，李苦禪二十六歲。李苦禪文中寫到，齊白石說你怎麼不問我要畫？您要養一大家子人吃飯，怎麼能要？老人聽了，頗為感動，當即送他一幅《不倒翁》。老人送李苦禪五幅畫，還贈與李燕《世世太平圖》。可惜，《文革》期間，這些字畫全都抄光。幸好李燕將齊白石贈送的印章藏在破雞



▲李苦禪、李燕父子 作者攝



▲李苦禪生前志趣甚廣

作者攝

窩裏保存下來。讀李苦禪此文，令人感動不已。

去看望李苦禪的那天，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八日，星期日。歸來，將與李苦禪先生的聊天，記錄下來。這也成了難忘的記憶：

他剛剛大病初愈，八五高齡依然健康，身體硬朗。僅僅兩個多月的功夫，他就又能自己上下樓，每天練習書法，以增加腕力。

他頭髮幾乎脫完了，只有腦後一小部分頭髮尚存，都是銀髮。

他戴着一幅黑色膠框眼鏡，臉色略露紅潤。依然牙齒滿口，上頰上的肌肉略略鬆弛。整副神情仍不顯衰老。

他穿一件灰色毛衣，外套上一件棉背心，黑色緞面，上有暗淡的黃色圖案。

老人十分健談，興致很大，談到興奮處，常情不自禁笑起來。談到有興趣時，旁人難得插上話，滔滔不絕，表情豐富。

他的兒子李燕對我說：「聽你講話好像是安徽、南京一帶人。」我說我是湖北人。

老人一聽，話便多起來。他早年學過京戲，便說：「唱京劇得帶湖北腔，學京劇也得知道漢劇。」說到這裏，老人便念起一句京劇道白：「湖北有個黎元洪。」他故意加重了漢腔味。我聽了，開心地笑了。

老人知道我是復旦畢業的，便又談起上海。他問起震旦大學情況，說震旦在清末出過很多書，英語教科書就是那時出的。

老人談起了前不久《北京日報》(或其他報)上刊登的一篇談毛主席一九一九在北京辦勤工儉學的文章。老人說：「當時我也參加了。毛主席、徐特立成了同學。毛主席那時年輕，不是送學生出國，而是自己也是學生，準備出國。當時的教務長叫彭濟群，現在九十多歲了，還活着。現在活着的同學還有我、彭、傅鍾三個人。傅鍾八十四歲，我八十五歲。」

老人也講到抗日時期，他在北京被關進過北大的紅樓，當時那是日本憲兵司令部。老人後來常畫畫賣，資助八路軍家屬。

老人談起自己演過京戲，作為抗戰時的一種寄託。他說：「樓上現在三個武把子。」

一會兒，李燕拿出了一本《李苦禪畫集》讓先生題字送給我。先生拿過書，提起筆，便在書上寫下了「李輝同志正腕。八五歲苦禪識」。寫罷說：「咱們姓李的字不好寫，咱們常寫還好一些，一般人就更寫不好了。人們還有點封建，說姓李就是李白之後，說姓趙就是趙匡胤之後。」

在寫字之前，老人問我的名字，我說李輝，他看看我，又看看李燕，說：「我有個遠房侄女也叫李輝。」

李苦禪先生說：「百家姓上叫趙錢孫李，有人就說要李先念。這是說着好玩的。」他重複好幾遍「李先念」，自己樂得大笑。

沒有想到，七個月之後李苦禪先生因病逝世。我前往北京醫院，送老人遠行……



民國時代的婚戀，得風氣之先，艷若桃李，燦若群星。論愛情之跌宕起伏，波濤洶湧者有之，波瀾壯闊者有之，驚濤拍岸者有之，石破天驚者亦有之。然則，驚天動地的愛情，轟轟烈烈有餘，卻似乎注難難以成就天長地久的美好童話。在民國文壇，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俯拾即是，每每高潮迭起，可惜卻往往戛然而止，遭遇分道揚鑣的無言結局，最終難免相忘於江湖，甚至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來。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文壇伉儷，實屬鳳凰麟角。而錢鍾書與楊絳、吳文藻與冰心，可謂當中之表表者，婚姻幸福美滿，羨煞旁人。

張愛玲曾經說：「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

民國賢妻的花式恩愛

沈言

間唯一吧。

蕭紅曾經說：「我只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只是互相諒解、愛護、體貼。」

正所謂琴瑟和鳴，只羨鴛鴦不羨仙。兩對璧人皆攜手走過大半個世紀，舉案齊眉，相濡以沫，親身演繹「願有歲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頭」。楊絳與錢鍾書，最愛對坐讀書，誦詩品茗，頗有李清照和趙明誠「賭書消得潑茶香」之餘韻。夫婦二人還擅取頰紅之香、湖紅之苦、祁紅之色，親手炮製「立頓紅茶」，重溫英國留學時光。冰心與吳文藻，晚年生活則對望寫作為伴，「終日隔桌相望，他寫他的，我寫我的，熟人和學生

來了，也就坐在我們中間，說說笑笑，享盡了「偕老」的樂趣」。不辨菽麥的錢鍾書，竟然會為坐月的愛妻精心熬製雞湯，更幾十年如一日堅持烹煮愛心早餐，滿溢寵溺之情。不善言辭的吳文藻，竟然會在書上加批註，特意對愛情字句劃線，寄予意中人分享，款訴含蓄愛意。不得不感嘆愛情的神奇魔力，足以徹頭徹尾改變一個人。目中無人的二介狂士，居然患有「譽妻癖」，從「最賢的妻，最才的女」，到「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毫不吝嗇溢美之詞。木訥寡言的一介書生，居然表白「做你的終身伴侶，是我最大的心願」，突破自我局限。

在小說《圍城》中，錢鍾書將婚姻比作

圍城，城中人想出去，城外人想進來。在他筆端：「愛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麼苦於終成眷屬的厭倦，要麼苦於未能終成眷屬的悲哀。」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他與她，卻在圍城中自得其樂。

木心在《從前慢》中說：「從前的日子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楊絳與錢鍾書，冰心與吳文藻，一輩子患難與共，不離不棄，堪稱《從前慢》的最佳代言人。從「只有死別，不再生離」的發心發願，到「江陰吳文藻，長樂謝婉瑩」的生同衾死同穴，死生契闊，一生一世一雙人。扶掖前行，經歷人生的驚濤駭浪，卻波瀾不驚，始終相依相伴，一任細水長流，水靜流深。

民國賢妻的花式恩愛，一舉打破「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的千古魔咒，實現「願得一人心，白頭不相離」的夙世夢想，一生一世，歲月靜好的婚戀童話，豈非人世間最美麗的風景？